

## “最好的歷史學”創造者們的共性

[加拿大]邱燕凌

(女王大學 歷史學系，加拿大 安大略 京士頓)



儘管歷史學研究者無法說清“好的歷史學”的評判標準是什麼，但也不能否認這些標準存在的可能性；而且，歷史學研究者在這個問題上並不孤獨，因為很多學科的研究者也無法準確地勾勒出他們學科的目標與界限。正像法國學者布魯諾·拉圖爾（B. Latour）所說的：

在某種特定學術領域中的專家們無法精確定義出他們所屬學科的內核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然而，當一個聰明的旁觀者對這些專家的工作成果進行仔細觀察後，反倒能確切理解其中內在的價值和方法。事實上，在定義某個學科的內核上，旁觀者往往

比局中人更能使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專家學者總是忍不住對與之相關的學科進行過多的論述，以示與這些近親同行區別開來，而一個有洞察力的旁觀者總是能避開這些包袱。

例如，對一個旁觀者來說，文學、歷史學與政治學研究者的論著都追隨相通的軌迹，通往類同的終點，並有着非常接近的讀者群；但這些研究者卻並不情願地宣稱他們有共通之處，而總是用“創造性的”、“觀念性的”、“具體性的”、“描述性的”、“經驗性的”、“解釋性的”、“敘述性的”等形容詞給自己或相近的同行貼上諸如此類的標簽。而實際上，這些努力都無助於準確描繪學科界限。例如，當我們要理解歷史學文章的內涵時，“經驗性的”和“理論性的”這兩種方法所界定的範圍，其實應該被忽略掉，以免造成誤導。在拉圖爾看來，觀察一個學科的核心實踐比調查這個學科理論上假定的界限更有啟發性。

通過對歷史學家的仔細觀察，可以發現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如何支配他們的時間總是成為他們相互交談及報告給觀察者的最主要的問題，但交談和報告的內容往往與實際是不相符的。比如，當被問及他們最近在做什麼時，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做研究，也有些人會談及一些細節——如何研究文獻、檔案，外出旅行搜集資料，對新材料的發現，甚至會告訴你，他的研究對理解歷史有什麼新的突破，等等。然而，當你仔細觀察一位成功的歷史學家到底在忙些什麼時，就會發現，他用於寫作的時間要比他做研究的時間多得多——相比之下，他對“寫作”而不是對“搜尋原始資料”更為着迷。祇要一有機會，他就會一次性花上許多小時、許多天、許多星期，甚至好幾個月來撰寫評論、論文或專著。作為寫作者，歷史學家會因此而忽視外在的世界，減少他們的社交活動，儘量不外出聚餐；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們甚至忽略對於做歷史學研究最重要、也是他們耗盡千辛萬苦搜集來的原始史料。即便他們被成堆的檔案資料和書籍包圍着，他們也仍然執著地緊盯他們發光的電腦熒屏——這個能使隱藏的歷史現象在文本中清晰顯示出來的百寶箱。歷史學家在這方面的表現實在令人難以理解，甚至連他們的家人也弄不懂他們到底在忙些什麼，而當被問及這個問題時，他們又總是含糊其辭：“是啊，這個真是沒辦法，不過要不了幾天我就弄完了。”

幸運的是，對於關注歷史學家的讀者來說，歷史學家長期的離群索居終究會拿出有形的成

① Bruno Latour, "Defining the Object of Inquiry", *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apter 1.

果——公開出版的論著。由此，讀者便可判斷這部著作是否達到了“最好的歷史學”的標準。如今，所謂成功的歷史學家，多是指他的論著被廣泛閱讀的歷史學家。這個評判標準已經被人們廣為接受並達成一致。例如，在我熟悉的領域裏，耶魯大學的史景遷（J. D. Spence）和加州大學的魏斐德（F. E. Wakeman, 1937—2006）的著作是傳播得最為廣泛的兩位學者，不僅被讀者，也被其他歷史學研究者認定他們是最優秀的歷史學家。他們的成功讓我認識到，是“寫作”而不是“做研究”成為他們成功的關鍵因素。事實上，一個做歷史研究的學者如果沒有作品是不能被稱為歷史學家的；這樣的學者尚未越過整理與說明原始資料來創造出歷史學作品階段。此外，如果一個歷史學家的著作沒有魅力，也是無法進入優秀學者的行列中的。無論一個歷史學家在他有開創性的研究中充滿了多少新的見解，如果不能進行充分有效的傳達，這項研究的社會價值將微乎其微。

由於寫作在歷史學創作中是如此的重要，年輕的史學工作者不僅要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研究者，同時也是一個寫作者。然而，這個注重寫作的建議對於那些選擇歷史學專業的大學生來說恐怕不太必要。大學的歷史課程通常要求學生進行大量的閱讀與寫作，而閱讀作為寫作者必需的訓練，恐怕更應該提醒那些年輕初入門的學者。

相關的調查同樣揭示出，一個有魅力的寫作者不僅僅是從實踐中錘煉而來，而且還需要極為大量的閱讀。成功的歷史學家在他們的閱讀體驗上總是保持沉默，正如他們在寫作上不願多談一樣。他們對某一本特定的歷史學著作會表現得非常健談，但他們很少願意描述自己的閱讀習慣，也不大願意談及為讀書癖好所付出的代價——雜亂不堪的辦公室，家裏遭書籍入侵以至於極度收縮的空間。歷史學家的讀書生活也是一個相當耗費時間的活動。事實上，就消耗時間而言，寫作和閱讀都比做研究在歷史學家的工作生命中來得更為顯著。隨之而來的結果便是，那些著名的歷史學家公開出版的作品顯然證明了這些作者是通過浸淫於文學中而掌握了寫作的藝術。不僅在歷史學上，在其他學科上亦存在這種現象。也虧了那些最好的歷史學家在文學上的浸淫，他們的寫作纔充滿了才華和與衆不同的風格。而獨特和吸引人的文筆又使他們的作品熠熠生輝，即使讀者早已忘記他們讀到的內容細節，卻仍舊對這些優秀作品帶來的愜意流連忘返。

在考察那些成功的歷史學家如何使用他們的時間時，還有一個更為奇怪的現象：他們投入到教學上的時間要多過任何其他事情。一方面，歷史學家們在相互交談中經常抱怨教學任務如何嚴重影響自己做研究；而且，如果被問到新作品的寫作進展時，也會表示教學很快就會結束，並計算這個學期還有多少天或多少節課。但另一方面，“學生”在優秀歷史學家的工作生涯中充當了最為重要的角色——如果出於某種原因，他們所在的學校停止招錄學生時，他們寧願選擇離開去往新的學校，也不會盡情放鬆來享受遠離教學的生活。因為教學幾乎跟寫作一樣，一個成功的歷史學家要學會如何在課堂上營造鼓舞人心的氛圍，在指導學生時不能表現出傲慢、賣弄學問或不耐煩等，尤其是在解釋歷史時要把學生當成相互合作的夥伴。他們知道，如果沒有學生，歷史學家的研究生涯，尤其是交流部分是不正常的，連續性是不夠的；如果沒有學生多種多樣的觀點來激發思考，歷史學家的生涯也是不完整的。

從這一點來說，教學是“最好的歷史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通過教學，歷史學家能學會向人們解釋他們的研究的意義所在，從而形成他們即將出版的書中要展現出來的敘述與論證。此外，通過教學，歷史學家也可以持續更新他們的意識：隨着更年輕的一代人透



史景遷的代表作之一

魏斐德的代表作之一

過時光的過濾鏡解讀歷史事件，這些歷史事件的意義總是在發生變化。儘管已經形成固定思想觀念的歷史學家會被這個世界不停變換的興趣所影響，也會相應地重新解讀過去的歷史，但他們更為老舊的心態與精神總是變化得更緩慢。如果他們不與這些對他們而言非常新的事物保持緊密聯繫，歷史學家會慢慢地失去向公眾傳達思想的能力。直白地說，是學生充當起教師的職責，來引導他們的老師意識到當下正在改變過去。

在歷史學不斷發展的今天，還有一個非常不尋常的現象，就是許多學生竟在向他們的教授傳授研究方法。當然，這個現象通常是以一種間接的方式呈現出來的。例如，有時候，一個教授會認為學生沒有經驗，還很懶惰，因為他們把在網絡上進行了兩分鐘的搜尋當成做研究，對那些電腦屏幕上雜亂無章的碎片式的小文的興趣多過閱讀最好的歷史學家的作品，他們甚至竟然不知道許多恢宏的圖書館資料及檔案文獻在網絡上是進不去的。然而，在另外某些時候，學生的某些研究方法卻推動教授重新認識了在線網絡資源的豐富性。通過這些方法，一個學生搜尋到了某些充滿疑問或令人深思的信息，一個教授則一不小心發現了一些有價值的資料或者一個完整的尚未被探索的信息世界，一個全新的可以使創作激情盡情綻放的區域。大部分諸如此類的課題很顯然應該被分派或建議給學生去探索的，因為已經形成穩定思想觀念的教授不會對那些衆多新的課題太感興趣，此外，在練習如何做研究並要與課程大綱融為一體時，經過指導被有效組織起來的網絡資料探索對學生來說助益匪淺。

教授經常從他們聘用的助研那裏直接學習如何做研究，能力強的學生會教他們如何通過網絡搜尋資料，如果教授能給予明確的問題和要求，他們將能靈巧地透過層層網絡平臺挖掘到那些非常有價值的史料。教授和學生助理都能從中獲益。一個學生如果有機會能幫助一個優秀的教授做研究恐怕比他做一年或更長的課程作業更有價值，因為這份工作可以使年輕學者學到如何形成一個研究性的問題，設計一個課題，闡釋研究成果，並在會議或出版物中展示自己的研究心得。我們知道，隨着這個世界的分工細化到被隔開至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及不同的人群中去時，古老的實習期便隱遁不現，而多虧教授工作的多面性特徵，一個學生助理還有機會體驗在當今世界已經消失了的實習期。然而，歷史學的見習期應該被限定在一段相當短的時間內。等到助研學到了足夠使他成為一個獨立研究者的經驗，並回報了雇主在訓練上的投資，作為回報他也幫助雇主學會如何使用網絡搜尋資料的研究方法，而且在經濟上不再依靠僱傭關係時，也就到了新助研上崗的時候了。

總的說來，年輕的學者如果想脫穎而出成為最好的歷史學家的話，應該仔細對待寫作、閱讀與教學。但如果缺少一個關鍵性因素——個人興趣，那仍將會制約他的成功。一個成功的歷史學家往往非常熱愛歷史學工作，能從其中各種不同的實踐活動中得到樂趣和滿足。而這也使得他們在具有開創性及革新精神的創作中永不停止地追尋，不斷地在創建一個個全新的學術領域。比如，歷史學家在過去曾建立了社會學、人類學，還有政治科學等領域，近些年來則又幫助建立了性別學、環境學等。可以說，最能從歷史學研究中獲得樂趣的歷史學家易於在自己的領域成為最具“奇理斯瑪”(charisma)特徵的領袖。他們的讀者被深深地迷住，他們的學生也受他們激發而靈感四射；同樣，“最好的歷史學”也總是為了更為廣泛的大眾的福祉而被創作。當然，與幸福的歷史學家走得更近的同事、朋友，還有家人也總是更幸福，儘管他們並沒有對歷史學家的歷史學研究細節表示多少關注。因此，到最後，如何從歷史學中獲取樂趣的問題似乎變得與如何創作“最好的歷史學”同樣重要了。（作者註：本文由劉明明翻譯）

[ 邱燕凌，女，康奈爾大學博士，斯坦福大學博士後，加拿大女王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及環境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Smokeless Sugar: The death of a provincial bureaucra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等。 ]